

陈建华·著

唐代

咏史怀古诗 论稿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TANGDAI YONGSHI HUAIGU SHI LUNGAO

责任编辑 马 骏○封面设计 潘 群

<http://www.hustp.com>



ISBN 978-7-5609-4841-6



9 787560 948416 >

定价：24.80元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唐代 咏史

陈建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陈建华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ISBN 978-7-5609-4841-6

I. 唐… II. 陈…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1673 号

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

陈建华 著

策划编辑:李东明
责任编辑:马 骏
责任校对:李 琴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武汉正风图文照排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5

字数:198 000

版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次: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80元

ISBN 978-7-5609-4841-6/I·119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序

陈建华同志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即将出版，他嘱托我为该书写一篇序，出于我们的交谊，我欣然应允了。

我与建华相识多年，他于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到韶关学院中文系工作，长期任教中国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化史等课程，1998年开始担任中文系副主任。2002年9月，他调往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工作，现任人文教育系主任。本书是他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艾略特说过：“历史感蕴涵着一种领悟，不仅意识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意识到过去的现在性。”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生活在超现实的时空里，他必须进入到历史时间的隧道中进行思考和探索，他的创作也就必然带有历史的因子。一个具有历史感的诗人，他不仅要成为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见证人或追忆者；而且，他也要参与、承续并发展着文学的传统。而要承续和发展传统，诗人就必须站在时代的观点上，运用自己的知识视野、历史眼光和审美判断，去对相关人物、事件作出思考和评价，留给后人更多的启示。

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激发后代诗人创作情思的重要素材。中国的史家几乎无不能诗，中国的诗人大多也能读史，这就形成了“诗心”与“史识”的密切结合。咏史怀古诗正是诗人充分展现“史意”、“史识”的一个重要窗口。如陶渊明的《咏荆轲》，像是《史记》故事的诗化；白居易的《长恨歌》，虽所记历史的真实性引起了像陈寅恪等学者的怀疑，对其“信史”的程度作了系列考证，但不可否认，全诗所蕴涵的情感世界，使该诗产生了感人至深的魅力。

探讨咏史怀古诗中“史识”与“诗心”的结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就咏史怀古诗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汇编而言，目前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建华同志选择了“咏史怀古”作为唐诗研究的对象，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着较大研究价值的古典诗学课题。

在写作思路，上，《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首先探析了咏史怀古诗的发展



源流，力求显示出自《诗经》、《楚辞》以来中国文人心目中自觉形成的历史意识，并把这一时期确定为咏史怀古诗的滥觞期。对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咏古诗，重点突出左思“寄情出处、托之史事”的“变”的特征。对曹植、阮籍、鲍照、陶渊明等诗人在咏史怀古诗上的创作特点及其成就，也有较为准确的定位、分析和评价。在论述过程中，建华同志尤其注意揭示咏史怀古诗从开始的寄生于史料，到逐步游离于史料，再到把史料变成情志寄托的工具这一演化的轨迹，突出了咏史怀古诗由史学附属走向诗学本体、最终回归到诗心的重要历程。

该书把重点放在唐代，乃是因为唐代无疑属于咏史怀古诗的丰收期。第一，此时出现了一批咏史大家，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他们的诗作，纵横捭阖，新意迭出，韵味深厚。第二，唐代出现了写咏史怀古题材的作家群落，诗人们借助史事，谈论国运政局，抒发个人遭遇，历史成为联系古今的重要契合点。第三，唐人把写诗当成事业的重要部分，出现了专门的咏史怀古诗集，有不少作品立意精深、技巧娴熟、境界高远，有的甚至擅长于议论，有着很深的哲理。这几个特点，在建华同志的文章里已得到较为清楚描述。

该书的下编，挑选并汇编了建华同志的一部分专题论文，看得出他在这方面有着较长时间的思考。选题比较集中，论述有所侧重，行文流畅，征引繁富，观点稳妥，不乏新意。对前部分的纵线论述，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无庸讳言，该书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咏史怀古诗题材归类和题材演进史，是一个很有理论深度的问题，希望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深透一些；其次，书中对咏史诗顾及较多，对怀古诗顾及较少，两者之间的界限，也还需在理论和创作上作进一步的厘定。

以上是我的一点看法。在此，我衷心期望建华同志能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丰硕的成果！

魏中林

2008年6月

目 录

序	魏中林 (I)
---------	---------

上编 咏史怀古诗纵论

第一章 咏史怀古诗的主要体式	(5)
第一节 传体咏史诗	(5)
第二节 比体咏史诗	(6)
第三节 “赞体”、“论体”咏史诗	(7)
第四节 怀古诗的含义	(8)
第五节 怀古诗与咏史诗的联系	(10)
第二章 先唐咏史怀古诗概述	(13)
第一节 《诗经》、《楚辞》的咏古诗	(13)
第二节 汉代的咏古诗	(15)
第三节 魏晋的咏古诗	(16)
第四节 南北朝的咏古诗	(22)
第三章 初唐的咏史怀古诗	(26)
第一节 唐太宗时期的咏史怀古诗	(26)
第二节 武后、中宗时期的咏史怀古诗	(28)
第三节 陈子昂的咏史怀古诗	(32)
第四章 盛唐的咏史怀古诗	(35)
第一节 朝廷重臣“二张”的咏史怀古诗	(35)
第二节 田园诗人的咏史怀古诗	(37)
第三节 边塞诗人的咏史怀古诗	(39)
第四节 李白的咏史怀古诗	(42)
第五节 杜甫的咏史怀古诗	(49)
第五章 中唐的咏史怀古诗	(54)
第一节 大历前后的咏史怀古诗	(54)



第二节	韩、柳及贞元、元和、长庆时期的咏史怀古诗	(59)
第三节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	(64)
第四节	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	(66)
第六章	晚唐的咏史怀古诗	(69)
第一节	黄昏衰世中咏史怀古诗的全面勃兴和咏史专集的出现	(69)
第二节	许浑、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怀古诗	(71)
第三节	晚唐其他诗人的咏史怀古诗	(79)
第七章	咏史怀古诗的表现技巧	(86)
第一节	“诗”、“史”的界限及其相融	(86)
第二节	咏史怀古诗的时空表现	(88)
第三节	咏史怀古诗的情景组合	(92)
第四节	咏史怀古诗的“言志”与“议论”	(97)
第五节	咏史怀古诗的修辞运用	(104)
第六节	咏史怀古诗的结构及构思特色	(111)
第七节	咏史怀古诗的辩证法探析	(118)

下编 咏史怀古诗等专题论文

论唐代咏隐士诗的思想性	(122)
寓兴亡之叹 托奇丽之辞——唐人咏吴越史事诗作概评	(128)
继承 拓展 创新——评唐代的咏王昭君诗	(136)
陶潜——李白诗歌的一个文化情结	(143)
唐代诗人的屈子情结	(151)
历代咏“三良”诗文评述	(159)
许浑咏史怀古诗得失探	(169)
试论谢灵运和李白山水诗的文化性格——兼论李对谢诗的借鉴和超越	(175)
试论诗学中的翻案问题	(183)
后记	(191)

上 编

咏史怀古诗纵论



唐代的咏史怀古诗，一直是我心中缠绕、沉吟和品味的对象，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诗人在诗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像一幅幅亲切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场景，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生活的真实面貌。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伏尔泰也说过：“人这种类型融化在历史过程中。人是什么，不是靠对人本身的思索来发现，而只能通过历史来发现。”^①人是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它不是抽象的范畴，或是独立的“我思”式的主体，而是自身就必然有历史意识的主体。以上这些思想，是我们研读唐代咏史怀古诗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改造社会，开创新生活，追求美好未来，也必须反思历史，以古鉴今，从中寻找有用的历史经验和人生智慧。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深沉的文化积淀，陶冶了汉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一如 L. 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一书所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片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②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所凝成的文化性格，随着历史的淘洗，越发绽放出青春和魅力。

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修史的国度，从《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直至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乃至新旧《唐书》、元明清正史及野史等，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丰厚的、沉甸甸的史官文化。

“历史”这个词，一般认为近代以来才有，最先只用“史”字，它指的是担任祭祀、星历、卜筮、记事等职的史官。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从又（右手），执中；中，正也。”清人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史’字是从手持簿书”；近人王国维《观堂集林》：“‘史’字义为持书之人”。汉唐之后，“史”字不再用以指称史官，而是用以称历史记载了。

^① 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中译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255页

^②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页



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多用“史记”一词称历史记载，唐初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以“史”为四部之一，“史部”显然是专言历史记载的。美国史学家康尼尔·李德给“历史”所下的定义，与中国人所持的观点十分相近：“历史指记录下来的或未记录下来的对人类往昔经验的记忆”^①。可见，认同“历史是对过去知识的记忆”的说法，在中外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史的中国，也是重记忆、重传统的中国。

中国源源不绝的历史记载，形成了文献繁复的文化遗产，诞生了像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志体、通考体、会要体等等史学的不同体式，凝聚成为内涵丰富的各种史学观，提升了史学的文化品位。

中国历史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它记载了炎黄子孙艰难的奋斗历程，矗立起一座座内蕴丰富、永垂青史的丰碑，既有可歌可泣的故事，也有令人为之扼腕的叹恨。历史是一面镜子，朝代的盛衰存亡，给后人提供了许多借鉴。正如《诗经》上所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追忆过去，为的是警醒将来，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中国厚重的历史背景，是咏史诗得以萌蘖繁衍、蔚为大观的温床，诗人咏史的过程，就是寻求文化价值判断的过程。诚如王立先生所说：“文学不仅是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的折光反映，也是既往历史及创作主体记忆表象的审美价值判断与形象意绪的重温。”它“突出地体现为一种试图复活逝去价值或利用既往求得现实变革的不懈的努力”。^②“复活价值”和寻求对现实进行变革，是咏史诗文化价值之所在。这一点，正同于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论述：“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者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说，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

咏史诗可以说是“历史的诗”。“咏史就是通过历史对象使主体的情感客观化”^③。凡是对某一个或几个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歌咏，发表评论意见，

① 张文杰等：《现代西文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44页

②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104页

③ 肖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1月，126页



借以抒泄情感，发表见解的诗歌，都可称为咏史诗。

就“历史对象”而言，咏史诗可分为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三类。在三类中，前面两类比较普遍。第三类，有人称之为“史林杂咏”。它选取的是历史上若干类似的人或事，以之作为咏唱的对象，时间的跨度比较大。如咏唱民族正气、世态炎凉、功高多厄、文人相轻之类。

咏史诗又是一种具有特定表现形式的诗。这种表现形式，有就事论事的，即作者艺术地再现当时历史的画面，对前人或往事进行褒贬，提出某种政治见解和哲理观念；也有托古讽今、指桑骂槐，即作者隐曲地表达人生际遇和复杂情怀。可以看出，咏史诗如果没有适合自身表现特征的体式，就不可能生长得如此顺利、壮大得如此迅速，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着如此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第一章

咏史怀古诗的主要体式

第一节 传体咏史诗

“传体”一词，出自清人刘熙载的《艺概》。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把“传体”称为“正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隐括本传”，即是以史诗的形式为人物立传。如东晋诗人卢谌，其《览古》诗：“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与之将见卖，不与恐致患。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藁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贤。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挥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爰在澠池会，二主尅交欢。”该诗吟咏蔺相如澠池之会完璧归赵的史实，除了以诗的形式记载这一历史过程、称颂蔺相如的美德外，并无其他托意。再如南朝宋诗人颜延之的《五君咏》，分咏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如咏阮籍：“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言阮籍外表沉晦，其《咏怀诗》多用比兴寄托手法隐晦表达心迹，其对世事的感愤和不满，在穷途而哭泣的场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传体”的咏史，最贴近史实，铺叙的形式也近似于史笔。

在艺术技巧上，“传体”诗歌最看重剪裁，尤其表现为组织历史素材的能力。如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一首，就是雄视千古的“传体”杰构。该诗简单地概括了秦王一生的功过，诗中除了对秦王的求仙有所嘲讽



外，并未做过多的议论。再如《古风》第十首“齐有倜傥生”一篇，歌咏鲁仲连却秦救赵、功成不居的高尚行为；《古风》第五十三首“战国何纷纷”一篇，感叹战国时期的公室衰微，卿大夫争权窃国的纷乱局面。在诗人的叙述中，我们感到作者是在为历史人物立传，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倾向，只能透过字里行间去作深刻解读。

中唐时期，柳宗元是写“传体”诗的高手，有《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诗。其《咏荆轲》讥评荆轲不知秦王与齐桓公之不同，盲目效仿曹沫用匕首劫持敌国之君。在隐括本传之后，诗人对这种“勇且愚”的举动略加议论，以明得失。

必须指出，“传述历史”的诗歌体式，由于更多局限于人物行迹的记述，缺乏诗人对事件本身进行引申和发挥的空间，导致了作者对史实的过度依赖，缺少艺术的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传体咏史诗以最单纯的形式为人物立传，开启了以诗体咏叹历史人物的先河。

第二节 比体咏史诗

比体咏史诗，侧重于“言在此而意在彼”，使诗篇里存在着足以让人们回味无穷的寄托。诗人相对游离于史料之外，史料成为寄托情志的一种工具。意含寄托要比平面的语言叙述方式困难得多，创作水平也要高出好多，因此容易受到历代诗评家的推崇。朱自清《诗言志辨》把咏史诗归为“比体”，与游仙、艳情、咏物诗相提并论，他看重的正是这类诗歌的寄托含义。

什么是“比体”？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云：“《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①用隐语的形式来作比况，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达到“理之无定在”，这，就是比体的含义。

相当部分的咏史诗是具有“比体”性质的。该体式发源于晋代左思的《咏史》，至唐代陈子昂时期，由于创作量的不断加大，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终至达到如清人王夫之所赞赏的那种“搅碎古今，入其兴会”的境界。

在比体诗的写作上，诗人必须对史料采用蜻蜓点水式的发挥，正如镜中

^①（清）王夫之：《姜斋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18页



之花，水中之月，不黏着，不拘泥。一如清人沈德潜在《说诗碎语》中所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经下邳圯桥》，本怀子房，而意实自寓；《远别离》，本咏英、皇，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杜少陵《玉华宫》云：‘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伤乱唐也……他若讽刺贵妃之酿乱，则忆王母于宫中；刺花敬定之僭窃，则想新曲于天上。凡斯托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之小序可稽，在读者以意逆之耳。”也就是说，李白咏史诗歌已经“以意出之”，在咏史过程中，历史只是被作为一个表现情感的躯壳，比兴寄托才是诗人最为真实的本质。钱钟书《管锥篇》中指出：“诗中所未曾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合。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咏史诗中所言为古事，所托为今事，就是比体诗的主要特征。

一般而言，作者有某些感触，或有难言之隐，就会考虑用咏史的形式来表达。大家所熟悉的陈子昂《燕昭王》诗：“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咏战国时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故事，惋惜昭王时代的不再，诉说自己霸图难现的失意。全诗淡化所咏人物的史迹，重在寄托对世态的感受。读者对诗人这种感受的回味，是在解读诗人所勾起的那段历史的基础上，才能重现出来的。

第三节 “赞体”、“论体”咏史诗

宋人费衮在《梁溪漫志·诗人咏史条》中指出：“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汪遵《读秦史》章碣《题焚书坑》二诗亦甚佳，至如世所传胡曾《咏史诗》一编，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费衮论诗，非常重学养、重胸襟、重本色，他认为作诗当以学问为根底，作者须“见处高远”，“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通过寄寓大议论来以古鉴今。他的理论，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就诗例而言，中唐时的咏史诗，尤其喜欢加上几句议论。如鲍溶的《读书》一诗，写刘邦、项羽的起兵与鸿门宴的情景，及项羽最后兵败的史事。在结尾处以“区区亚父心，未究天人际。萧张马无汗，盛业垂千世”四句，说明帝王的成败乃取决于天意民心，而非少数人的意志。卢仝的《感古四首》之四，叙述汉时会稽太守朱买臣故事。在议论方面，有“君莫以富贵，轻忽他年少”，“乃知愚妇人，妒忌阴毒心。唯救眼底事，不思日月深。等闲取羞



死，岂如甘布衾”这样的议论，有点睛之效，有垂诫之意。可见，感叹之词，是咏史诗的特质与成功要素之一，缺少了这一点，就不是合格的咏史诗。但无可否认，感叹之词的高下优劣，决定着咏史诗的品位。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云：“读史诗无新义，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之味，又似史赞一派，俱非诗也。”但如果咏史诗过多地“出己意，发议论”，也会落入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所指出的“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的窠臼。可见，议论的恰到好处，是诗人必须把握的尺度。如果画蛇添足，就会让人生厌。

以上三种形式，一般说来，第一种称为“正体”，后两种称为“变体”。但究竟怎样的咏史诗，才算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呢？

唐人吕延济在《文选·咏史诗》条中云：“览史书，咏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只要有感情的倾注，诗味就会很浓厚，人们也就会普遍认同它。

清人吴乔说：“用意隐然，最为得体”^①。只要是“隐然含蓄”、耐人寻味的，就能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含蓄。

应该指出，有创作个性、展现广远艺术时空的咏史诗，才是好诗。从这个标准来衡量，李白式的咏《苏武》诗之“唱叹写神理”，左思式的《咏史诗》之“多摅胸臆”，一直以来几乎得到人们一边倒的认同。

总之，有作者主观意志的、具有强烈个性的“变体”的咏史诗，由于它避免了平淡和庸俗，故能够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相关的诗歌得到肯定的评价，应是在情理之中。

第四节 怀古诗的含义

怀古是许多诗人共有的情结。鲁迅先生在小说《风波》中写九斤老太太不停地唠叨：以前的天气没有现在这样热，以前的豆子没有现在这样硬，以前出生的小孩斤两比现在要重，于是得出了“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有人以为这是她年龄大了的缘故，确实是有道理的。人老了，对未来期望无多，只好在追怀中表达对今天时代或人生景况的不满。但要看到，能够常常引发

^①（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三，见郭绍虞等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58页



怀念，比彻底死了心、乃至万念俱寂的人生还是要好一些。

从这一点看历代的诗人，他们何曾不是如此？他们不断地怀念往事，正说明对当下时局有着很想表达的微词、有着许多不能自己的隐衷。请看以下的诗赋：汉张衡《东京赋》：“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①南北朝庾信《伤心赋序》：“既伤即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斯既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韜之母，任诞之亲，书翰伤切，文辞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②南朝宋诗人鲍照《采菱歌》：“思今怀近忆，望古怀远识。怀古复怀今，长怀无终极。”^③《晋书》卷三十四《羊祜等传》：“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岷山置酒，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④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明人刘基《绍兴崇福寺记》：“因登其皆山之楼，眺于群山，悠然而怀古焉。”诗人和辞赋家所怀想的内在情感和意义可能不一样，所指的情感意向也有不确定性，但“怀远识”，即追踪古事，托古讽今，却是他们思维的共同点。

这里涉及一个心态的问题。人是复杂社会群体中活生生的“一个主体”，祖先崇拜、伦理亲情和民俗事象，构织成一张张必须面对的“社会之网”，人们就这样在挥不去、躲不掉，充满着阳光、鲜花，或者充斥着痛苦、无奈的环境中生活着，形成了日常无意识的社会心态。法国人雅克·勒戈夫在《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一书中指出：“心态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因为，心态史所揭示的是他们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心态学家必须注意某些主要因素。在探索某一特定心理习惯、表现或举动的来由时，人们必须注意到连续性，同时也要注意到终结性和间断

^① 费振纲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45页。

^② （清）倪璠纂：《庾子山集》，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三册，48页。

^③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271页。

^④ 《晋书》卷三四，见《二十五史》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360页。